个人破产制度正当性法律问题研究

于金含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个人破产制度是解决经济转型瓶颈期社会大背景下自然人过度负债严重问题的一大重要方法,《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出台成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构建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囿于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与社会实践现状等诸多因素,个人破产制度的制度正当性观念基础仍需进一步探讨与构建。本文结合学界诸多理论对个人破产制度中的公平分配、不可免责债务与信用限制对价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讨论,这三个问题也应个人破产制度的正当性构建过程中予以重视并研究对应解决方法。

关键词:个人破产制度;公平分配;破产免责;信用公平

引言

新中国自1986年实行《企业破产法(试行)》以来,一直将破产主体限定在企业法人,而对于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等主体的破产制度则长期缺位。这一状况导致我国缺乏允许个人破产的法律基础和依据,给相关主体的债务问题处理带来了诸多困难。从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社会现状来看,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先,自然人无法通过个人破产程序进行清算和困境拯救,导致负债累累的自然人成为多个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其次,担心自己的债权得不到保障的债权人可能采取抢先执行、暴力催债等恶性手段追债,这不仅侵犯了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社会秩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界对个人破产存在大量的误解。许多人认为破产就是合理合法逃脱债务,对个人破产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不认同,这种误解导致缺乏推行个人破产制度的社会观念基础。另一方面,国家在处理债务问题时过度依赖执行程序,以执行程序来代替破产,这一点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尤为明显。然而,个人破产制度与执行程序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双方各有其独特的功能价值。执行程序主要针对已经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

进行强制执行,而个人破产制度则通过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清理、分配,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公平保护^[1]。

回顾破产制度的发展历程可知,个人破产制度在整个破产制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它是企业破产制度的基石。明确赋予自然人破产权利,不仅是对自然法中平等原则的尊重,也是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保障。通过个人破产制度,可以实现对债务人的公平对待,避免其因一次失败而陷入终身困境,同时也为债权人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债权实现方式^[2]。

基于个人破产在多个层面的立法需求,本文试图探讨个人破产制度在后续立法发展和广泛落地施行过程中的可改进之处,并通过这些探讨帮助构建制度正当性的社会观念基础,充分发挥个人破产制度的社会价值。

一、公平分配制度在个人破产中的功能与价值

(一) 公平分配制度的核心内涵与价值

目前社会民众有一种观点认为,个人破产制度有让全社会替破产人承担债务之嫌。事实上不仅是个人破产制度,实施已久的企业破产制度也时常遭受此类质疑。笔者认为正是因为

以下几点顾虑使民众对个人破产制度产生此种误解：

首先民众对于破产制度的普遍认知就是破产免责，过度关注于破产可以让破产人合法免除剩余债权这一方面，没有看到破产制度能让债权人公平分配破产人剩余财产这一显著优点，更是忽视了破产制度下破产人重整后能够给各方带来的种种好处。其次破产人成功破产并免责后，免责债权的债权人被迫承受一定的经济损失，社会中每一个对他人享有债权的个体都有可能遭受此种损失，从该角度来看，确实存在破产人的不幸由社会来承担的现象。最后，成功通过个人破产制度破产免责的自然人增加后，银行的自然人贷款的坏账率与社会各类借贷机构的坏账率都会不可避免地提升，有意愿将闲置资金借给亲友的自然人也会面临合法债权不能实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保有自身利益的考虑，银行和借贷机构会严格借贷条件，使贷款门槛升高；自然人也会谨慎向亲友出借资金，由此全社会的自然人的借贷成本和难度都会相应提高。

笔者认为，个人破产制度的公平分配功能是解决民众对于个人破产制度的前两点顾虑的主要途径。从历史和比较法的角度审视，个人破产制度的本质在于对债务人非豁免财产的搜集、清理，并以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与破产免责相比，个人破产制度的公平分配功能显得更为古老、更为根本。这一点正是个人破产制度区别于执行制度的核心所在。通过个人破产制度的公平分配功能，所有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能够依照法定顺序和比例获得应有的赔偿，从而切实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该功能也在防止债权人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和抢占先机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个人破产制度中的公平分配原则，旨在通过归集破产人的财产并进行公正的分配，以实现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原则确保了所有债权人在破

产程序中能够按照法定顺序和比例公平受偿，从而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个人破产免责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豁免了债务人未能清偿的债务，可能会减损债权人的利益，但它的存在实际上为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免责制度的设置，破产人被激励与债权人、破产管理人积极合作，共同推进破产程序的进程，以便更好地实现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债务人合作理论正是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核心思想所在，该理论认为，免责是对债务人的一种“诱惑”，通过这种诱惑促使债务人在破产案件中积极配合，与债权人、破产管理人共同确定、收集和清算债务人的资产。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增加可供分配的资产规模，还能降低进行分配所需的管理成本，从而提高债权人的实际受偿额^[3]。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放弃了破产后未来清偿的可能性，转而追求当下能够获得更大的破产分配^[4]。因此，个人破产制度中的公平分配制度和免责制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保障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法律机制。

（二）公平分配制度在正当性基础构建中的作用

通过延伸使用信用公平理论，可以得出如下分析：破产人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披露给各债权人，这些财产将公平分配给各债权人。尽管破产人剩余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但是债权人至少可以从公平分配中获得如下几个好处：首先债权人的债权能够通过破产分配得到一定程度的清偿，获得一定的财产性收益；其次债权人能够大大节约向债务人追讨债务的时间和精力成本；最后，通过破产程序实现的公平清偿，虽然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获得全部清偿，但可以避免个别债权人“先下手为强”^[5]。一方面，个人破产公平分配制度可以防止防止哄抢财产甚至暴力追债等乱象，暴力催收、非法拘禁、恶意讨债等行为屡见不鲜，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

秩序，激化了社会矛盾，迫切需要通过个人破产公平分配制度来应对。

二、不予免责的亲属间民间借贷

(一) 不予免责制度简要介绍

并非所有类型的债务都会在债务人成功申请破产免责后获得免除，因为部分类型债务的特殊属性，即使债务人申请破产也不能被免除，特别是非市场交易导致的债务。这些债务往往与公共利益、人身关系等密切相关，如果一概纳入免责范围，可能会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基本权益，甚至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例如，婚姻家庭债务和学生教育贷款债务等涉及到个人的基本生活和未来发展，如果轻易免除这些债务，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6]。

这些不可免责的债务主要包括如下类别：第一，因侵权行为、行政违法行为以及犯罪行为引起的债务。第二，基于人身关系产生的债务，主要是基于婚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而产生的法定抚（扶）养费等债务。上述债务往往存在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这些债务的形成并非基于市场交易；其二，对这些债务的免责易于引发道德风险。

(二) 亲属间民间借贷

除上述几种非市场性债务不能被纳入破产免责的免责范围外，笔者认为对于部分特殊的民间借贷也应该审慎考虑是否应当被剔除出该免责范围。分析这类民间借贷，同样会发现其同时满足“形成并非基于市场交易，对这些债务的免责易于引发道德风险”这两个特征。一方面，此类债务的形成并非以商业投资或市场交易目的，盈利机会不大；另一方面，亲属间出于情谊借出的救急款项带有极大的帮助性质，如果贸然对此类债权进行破产免责，那就违背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一理念最初所指的必须偿还的那部分债务，势必会对民众对公序良俗的朴素期待产生冲击，继而容易

引发道德风险。如果这类亲属间民间借贷能被破产免责所规制，那么将大大降低民众出借此类款项的意愿，或会倒逼民众采用约定利率、要求提供担保等方式来抵抗债权无法实现的风险，如此便会导致这类借贷的屏障作用大大降低，让民众失去这一容错空间。

从风险与收益关系角度来看，此类亲属间民间借贷的收益较少乃至几乎没有，债权人应当承担的风险也应当与其收益相对应，给予这类债务一个从破产免责的免责范围中排除出去的机会便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坏账风险，达到收益与风险的平衡。

三、信用公平理论框架下的信用限制

在信用公平理论的框架下，破产制度通过对破产主体进行信用负面评价或施加信用不利限制来平衡债权人的心理平衡感。就企业破产而言，企业法人是虚拟人格，企业可以通过破产制度退出市场，注销法人资格，这种破产主体的消失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债权人的心理平衡。但是自然人则不同，破产制度可以限制自然人诸多权益，却不能消灭自然人，自然人会继续存续。显然，无论怎样分配债务人现有的财产和预期的收益，如果不能完全清偿债务，债权人感受到的公平性都会受到限制。为了缓解这种不公平感，建立一个公平、客观的个人信用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这个体系可以对债务人的信用行为进行评价，包括他们履行债务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他们的还款意愿和能力。通过个人信用记录的积累和分析，可以更准确地衡量债务人的诚信程度，从而为债权人提供一个判断债务人偿债能力和决定是否继续追债的依据^[7]。或通过信用体系上的负面评价为债务人增加限制，将这种限制作为获得破产免责的对价条件。这种机制可以说展现了一种新的解释破产免责合理性的思路，但是基于我国实际情况，以下几个因素可谓是对该机制的运行提出了挑战。

(一) 传统观念使民众对信用限制期望过

高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守诺践约”的价值观,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念认为个人应当对自己的承诺和行为负责,这种观念深植于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之中,“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父债子偿”等观念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破产制度,特别是破产免责制度,与我国群众的朴素社会观念发生了较大冲突,这一冲突间接导致了民众对获得破产免责许可的破产人的信用负面评价的心理预期较高。换言之,单纯禁止乘坐高舱位交通工具、禁止高档娱乐场所消费、禁止购买不动产、机动车辆等信用限制难以满足民众心中对破产债务的破产人的信用限制的期待。

(二) 信用限制能否有效实施遭到质疑

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个人破产法律制度得以顺利建立和实施的重要前提,建立健全的个人信用管理监督系统也是构建个人破产制度的关键基础条件。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统计数据也显示,我国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当规模的成果,仅2023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就提供个人信用报告查询51亿次,企业信用报告查询1.6亿次。然而,由于目前我国的个人征信平台主要由各部门或不同行政系统分散性地建立,这导致了个人征信信息的碎片化和不统一性。例如,法院系统的失信被执行人平台、银行系统的征信平台、土地房产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征信平台等,这些平台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和整合,这给了不少失信人员利用系统数据库之间的漏洞继续进行高消费行为的机会,这种不公平情境极大打击了广大民众心中对“欠债还钱”这一公序良俗的期待。而在深圳经济特区已经落地实施的个人破产条例的规定中,个人申请破产后存在相当一

段时间的考验期,顺利度过该考验期破产人就会对其所承担的债务拥有免责权,彻底恢复自由身。对破产人的考验期限制与对限制高消费人群的限制类似,但是实践中不乏各级法院签发的部分“限制高消费令”未能实现对其生效人员产生有效监督。广大民众担心破产人借助破产免责制度逃脱应偿还债务,同时维持高水准消费,待考验期满后正式顺利逃脱债务这一现象的出现,这一担心不无道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少数人逃脱了限制高消费令的约束,就因噎废食地对设置考验期的个人破产制度也敬而远之,因此,要正式让个人破产制度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还需要继续完善现有社会信用体系,努力使限高令、破产考察期等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回应民众的心理期待。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个人破产制度正当性构建中几个问题的梳理,总结出了几个民众对个人破产制度正当性存疑的原因。首先就是传统文化影响下民众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合理合法免除债务的破产制度不理解,对此不仅应当对破产人施加信用限制来满足其债权人的心理平衡感,还应当谨慎处理亲属间民间借贷,以免打破民众心中对公序良俗的期待,激化更严重的社会矛盾。其次是民众对破产制度的认知仍然停留在破产免责方面,尽管破产免责确实是破产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也不应忽视公平分配在破产清理时的重要作用。最后,少部分限制高消费人群的不良案例给民众导致对社会信用体制的信任程度有限,为了让民众相信对破产人的信用限制真实有效,在破产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应注重配套的信用体制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殷慧芬.个人破产立法的现实基础和基本理念[J].法律适用,2019,(11):69-76.
- [2]赵万一,高达.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J].法商研究,2014,31(03):81-89.
- [3]许德风.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J].中外法学,2011,23(04):742-757.
- [4]贺丹.个人破产免责的中国模式探究——一个国际比较的视角[J].中国法律评论,2021,42(06):60-74.
- [5]徐阳光.个人破产免责的理论基础与规范构建[J].中国法学,2021,(04):201-220.
- [6]刘冰.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J].中国法学,2019,(04):223-243.